

# 高校公共艺术教育面临“内忧外困”

■本报记者 陈彬

“你采访这些干吗？这里面的事情不是我我能解决的！”由于正在赶路，电话头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匆忙。

说这话的人叫任宝平，现为天津大学艺术教育中心主任。在不久前的一次关于普通高校艺术教育的座谈会上，他的发言得到了很多同行的认同。然而在面对记者的采访时，很直率的他却有些犹豫。

“大学的艺术教育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的。”任宝平说。

一番采访下来，记者对他的这句话有了更深的理解。作为一门面向全校学生开展的课程，目前的艺术教育有着它的尴尬与无奈，而这份无奈如果用一词概括，那就是——内忧外困。

## 内忧：“装点门面”的艺术教育

记者的采访是从一份无法落实的文件开始的。

2006年，教育部印发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指导方案》的通知，该通知规定：“各校担任公共艺术课程教学的教师人数应占在校学生总数的0.15%-0.2%，其中专职教师人数应占艺术教师总数的50%。”

“如果以一所高校两万人来计算，艺术教育的教师人数最少应是30人。而目前情况是，绝大部分高校的艺术教师只有几个人，最多不过十几个。”在接受采访时，北京某重点高校艺术教育中心主任张愈（化名）这样说。

2008年，曾有一项针对湖南省高校的统计显示，湖南省75%的高校未配备专职艺术教师。2011年3月，该省进行的公共艺术课程教学检查所涉及的12所高校中，无专职教师或缺少专职教师的学校更是达到11所。

“这份文件根本就无法落实。”这是在记者采访中，很多教师共同的声音。

“在目前的高校中，艺术教育的作用只不过是‘装点门面’。所以很难想象学校会舍得花‘大钱’。”董伟（化名）同样是某重点大学艺术中心主任。在他看来，对学生艺术修养、价值观和创造力培养有重要作用的艺术教育沦为“面子工程”，其中的原因除了历史形成的偏见外，艺术教育本身的问题也十分突出。

董伟表示，目前高校中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是，很多艺术老师仅仅在高校“挂个名”，平时并不将工作重心放在校内，而是在校外承接大量“私活”。在高校艺术教师群体中，这样的人占到一半以上。“我们确实有自己的问题，高校为什么不招艺术教师？因为招了也没有意义。”

除去“心猿意马者”，对于留守在高校中的艺术教师而言，其教学也存在着一定问题。

据了解，目前国内普通高校的艺术教育主要承担两项任务：为全校学生开办艺术选修课以及指导学校的艺术团。大部分教师将其主要精力放在了后者，而对惠及全校师生的选修课关注不足。

“很多人存在一个误解，那就是艺术团不属于艺术教育。”据张愈介绍，普通高校的艺术教育可分为多个层次，对大部分学生而言，艺术课程属于通识教育，学生通过课程对艺术有



图片来源：www.quanjing.com

感性认识；对于更有兴趣的学生，则可以继续选修以中抵人文社科课程的学分；至于特长生，则通过实践(艺术团)的形式加以培养。

“虽然社团教育也属于艺术教育，但大部分教师将精力主要放在艺术团上，而忽略了正常选修课的教学，导致课程内容陈旧，无法吸引学生兴趣，这无论如何都是不正常的。”张愈说。

对此，任宝平有着自己的看法：“艺术教师侧重于艺术团的指导有其自身道理，毕竟艺术团可以参加比赛，培养效果可以加以衡量。但艺术课教学属于选修课，我们如何衡量它的培养效果？如果难以衡量，我们又怎么能要求老师在这方面投入太大精力？”

然而，当高校本就稀缺的艺术教师，将大量精力放在少数团体时，高校艺术教育的培养质量便不能不令人担忧。

**外困：“打折”的教育行为**

如果问起艺术教育属于教育行为还是行政行为，相信大部分人都会回答是前者。但事实上，高校中的艺术教育即使是“教育行为”，也属于“打折”的。

张愈就曾经屡次碰到这样的情形。和其他学科的老师商讨问题时，一些老师就会有意无意地说上一句：“艺术教育不就是唱唱歌、跳跳舞嘛。”每次听到这种话，张愈总是觉得很无奈。

“时至今日，高校艺术教育依然没有摆脱‘文艺宣传队’的刻板印象，这导致人们对于艺术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她说，也正是在这样的认识误区下，高校艺术教育常常处于很尴尬的位置。

“目前存在着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董伟说，就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指导方案》中，教育部明确指出，为保证艺术选修课的开设和教学质量，普通高校应设立专门的公共艺术课程管理部门和教学机构。目前，各校的艺术教育中心一般承担这一职责，但作为教学管理部门，艺术教育中心却常被设在非教育管理部门的团委之下，有些学校的艺术中心虽与团委平级，但由于历史原因，双方的地位依然不平等。这种搭配显然只考虑到艺术教育的“娱乐功能”，其

上，高校中的艺术教育即使是“教育行为”，也属于“打折”的。

张愈就曾经屡次碰到这样的情形。和其他学科的老师商讨问题时，一些老师就会有意无意地说上一句：“艺术教育不就是唱唱歌、跳跳舞嘛。”每次听到这种话，张愈总是觉得很无奈。

“时至今日，高校艺术教育依然没有摆脱‘文艺宣传队’的刻板印象，这导致人们对于艺术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她说，也正是在这样的认识误区下，高校艺术教育常常处于很尴尬的位置。

“目前存在着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董伟说，就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指导方案》中，教育部明确指出，为保证艺术选修课的开设和教学质量，普通高校应设立专门的公共艺术课程管理部门和教学机构。目前，各校的艺术教育中心一般承担这一职责，但作为教学管理部门，艺术教育中心却常被设在非教育管理部门的团委之下，有些学校的艺术中心虽与团委平级，但由于历史原因，双方的地位依然不平等。这种搭配显然只考虑到艺术教育的“娱乐功能”，其

## 对本土“洋大学”的期待

近日，上海纽约大学在上海成立，它以华东师范大学和纽约大学为母体大学，也是我国“985工程”院校和美国一流高校首次合作办学的高校。这种建立于中国本土的“洋大学”，能否在接上地气的同时，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产生积极影响？

上海纽约大学校长俞立中表示，明年秋季将招收第一批本科生共300名。学校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教师队伍有40%将直接来自美国纽约大学，40%是在全球招聘的一流教授，还有20%是来自华东师大或其他国内大学的兼职教师，其中会有诺贝尔奖获得者。学生将每人配有一名导师，以全英文授课。学校本科教育采用通识教育模式，一、二年级的重点是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学生在三、四年级可选择文、理、工等不同专业。学生在大学4年里，有最多三个学期

弊端却显而易见——外行领导内行。

董伟表示，艺术教育有其自身的规律，艺术中心的教师大多为专业教育出身，在教学的理念方法上有自己的理解，但团委多只把他们看成宣传机构，仅从展示学校形象的方面进行要求。“事实上，这也是很多老师忙于艺术团活动的重要外在原因。

“社会发展至今，我们对艺术教育应有更高层次的认识。然而，团委老师一般都是刚毕业的年轻人，对艺术教育知之甚少，这种隶属关系很不适应艺术教学的需要。我们如何在管理上对艺术教育做合理规范，如何让其真正纳入教学体系中，这值得深思。”董伟说。

## 给教师一个宽松的环境

不久前，张愈遇到了一件让她很烦心的事情，她所教授的管乐课必须要停课了。原因很简单：找不到教室。

“以前，我的管乐课一直都是借用学校的招聘大厅。但不久前，大厅管理方更换了新领导，不再允许外借。于是，我们连教室都没有了。”张愈说。

“要改变目前艺术教育的尴尬现状，我们需要作很多努力。理顺管理体制自然是一方面，但同样重要的是给教师宽松的教学环境。”董伟表示，张愈的遭遇并非个案，在目前的高校中，艺术教育硬件设施的投入严重不足，很多学校的艺术教室往往被安排在地下室等边角地区，有些甚至根本没有艺术教室。“之前曾有一所大学建了一座很漂亮的艺术教育中心，但里面竟没有一个排练场！”

董伟所说的宽松环境，显然不仅仅包括硬件环境。

算起来，任宝平今年已经到了花甲之年，作为中国最早进行高校艺术教育的“先驱者”之一，如今的他已是正高职称，对此他很满足。“大学里做艺术教育的，能评上正高的真不多，有些学校甚至根本不给艺术教师评职称的机会，我有什么知足的？”

任宝平的知足在很多人眼中，却变成了无奈。

据了解，高校艺术教育作为通识教育的组成部分，教师极其重视的是教学的实践性，这决定了其工作能力主要体现在对学生艺术素质的提高，以及学校艺术团的成绩上。然而，目前艺术教师的职称评定却参考一般教师的评定标准，甚至包括科研和核心期刊发表论文等硬性规定。

“艺术教育并不属于学术研究行为，让整天围着学生、艺术团转的艺术教师到核心期刊上发文章，这的确确为其难了。”张愈说，我们需要建设一套真正适合艺术教育的职称评价体系。“总之，艺术教育要得到改观，需要首先使外部环境适应艺术教育的学科特点，给艺术教师以宽松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下，教师才能静下心来，认真研究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

在采访中，张愈说他一直有一个梦想：让学校的每个学生在大學四年中，都能听上两场真正的音乐会。“他们会因此获得艺术修养上的提升。”她同时笑称，尽管这一梦想有些“不切实际”，但自己会为之而努力。

只是，需要为此努力的仅仅是张愈吗？

## 第九届北京论坛在京举行：从文明角度求世界问题答案

■本报记者 温才妃 钟华

深秋时节，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在金色的银杏叶点缀下，更加大气、庄重。近日，北京论坛在这里开启了第9届的序幕。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新格局·新挑战·新思维·新机遇”，涵盖了经济、哲学、教育、城市、语言、新闻、企业家等八方面的分论坛。

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其凤在开幕式上表示，本届论坛将主题确定为“新格局、新挑战、新思维、新机遇”，是为了呼唤人文社会科学界引进更具开放性的思想资源，从而描绘更加和谐的发展模式。

**世界问题背后的文明危机**

对于世界来说，2012年是意义非凡的一年。世界多国领导人将举行换届选举，粮食、能源、气候等全球性问题的矛盾日益突出……如何应对世界格局风云变幻下的不确定因素，成为本届论坛讨论的重点。

事实上，在过去的8年里，北京论坛坚持“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的定位，会聚全球知名专家共商了“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责任与行动”、“传统与现代、变革与转型”等主题，不仅推动了亚太地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也为全人类的发展与繁荣作出了贡献。

小到PM2.5催热空气净化器市场，大到金融危机触动多国经济、政治动荡，“从北京论坛的视角出发，这些危机都可以归结为文明的危机。”周其凤说。

周其凤解释，文明制约着人对自我行为和

伦理的思考，在世界问题面前，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如何在挑战面前联合一致，只能在文明层面上予以解答。

德国图宾根大学荣休教授、世界伦理基金会创始人、主席 Hans Kjing 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能源危机、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并非天灾，而是人祸。“遗憾的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但是，作为道德指南的世界伦理至少提供了寻找答案的努力方向。”

在与中国文化的交流中，Hans Kjing 把多元文化的共同之处称为“同”，但是“同”并不意味着完全复制。“它的前提是尊重宗教和哲学奠定的文化多样性，不能压制善意的有见解之人。这种‘和而不同’的思想应该在全球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得到张扬。”

**大学在全球化中的使命**

“我有一个信息要在此传达，每个国家都要考虑的比本国人民更加长远。”印度前总统 APJ Abdul Kalam 指出，解决当下世界的三个危机——环境变化和气候变化、贸易赤字和全球经济衰退、贫困，需要全球范围内的大学、政府部门和私营部门都要参与进来。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Lee C.Bollinger 认同这个观点，他表示，全球化进程中的变化如此之快，导致人们的认识无法跟上变化的步伐。

“大学应该在这个过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让下一代及时了解新的世界。”Lee C.Bollinger 说，他同时提醒要想履行这样的职责，大学必须重新反思在研究和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在五大洲建立全球化中心网络是哥伦比亚大学全球化战略的重要举措，此举也使得哥大成为最具国际视野的大学之一。Lee C.Bollinger 深信，全球中心网络工作的开展既能保持学术的活力，也能促使师生们的思考方式发生改变，并将新思想传播回母校，给人以全球化视野下的教育与启迪。

“大学应该帮助人们区分什么是新的，什么看起来是新的东西。”英国科学院院长、牛津大学荣休教授 Adam Roberts 说，“如果你想让世界上所有东西都是新的话，这个思维很危险，因为我们有可能完全扔掉一些过去的想法。”

在他看来，区别什么是真正的新事物，必须建立在对不同国家的历史和社会关系的了解之上。

Adam Roberts 指出，英语语系国家正陷入一个认识误区——全球越来越多的人在学英语，而英语语系的人们认为可以省点工夫不学外语。

“这种观点是不对的。”Adam Roberts 表示，要想真正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需要从了解他们的语言、历史入手。他所在的英国科学院正在推动相关的外语学习工作，这在他看来“至关重要”。

**单靠教育难以改变社会不公**

教育是促进世界文明相互理解的关键所

在。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更为复杂。

本届教育分论坛以“世界经济变化中的教育发展：质量、公平与效率”为主题，与会专家讨论了“教育、劳动力市场与经济增长”、“高等教育财政：成本分担和学生资助”、“教育质量”等议题。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名誉院长、教育经济研究所所长闵维方教授表示，中国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而教育是支撑经济发展和转型的重要力量，同时还要肩负起兼顾公平和效率的重大责任。

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Martin Carnoy 指出，高等教育机会的扩大本应有助于带来更好的社会流动性及收入分配平等。然而，包括中国在内的金砖四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扩张没有使其收入不平等现象有所下降。

他解释，九年义务教育与高校扩招的不均衡，导致了教育中的不平等现象产生。更多的教育投入会促进经济增长，但是不会降低收入的不平等性。

“单纯依靠教育难以改变社会的不平等。因为其代价会非常昂贵，并且会影响教育的效率。” Martin Carnoy 多次申明，教育的本质的非非是要消除社会不平等，而是选拔并培养有才能的人，使之更有效地服务社会，在此基础上再去促进社会公平。

Martin Carnoy 表示，中国与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无法仅凭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机会的扩张来减少其社会不平等性，必须借助政府财政政策等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

可以选择在遍布世界各大都市的“纽约大学全球教育体系”的15个教学中心学习。而对于公众最关心的招生方案，他透露，学生仍需要参加高考，但是高考分数将不是唯一的标准，将有三种自主招生生的模式，最看重学生的素质。

优秀的师资、特色的课程设置以及更加科学的管理模式，无疑是这些本土“洋大学”最吸引一流生源的地方。但如果在未来，这些学校在招生方面能更加自主，教学方面能够自主管理、自授学位，那将会是对现有大学教育模式的重大突破。

其实，一百多年前，中国的现代大学就是从西方引进的模式。如今，把远隔万里重洋的世界一流大学搬到了中国内地，或许我们能够期待中国高等教育会有更多改革与进步。

## 中国大学评论

## “南橘北枳”的后EMBA教育

■熊丙奇

近日媒体报道，中山大学将于11月底开设超级富豪班。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徐勇表示，将在11月底开设后EMBA教育，要求报名者是50亿以上身家的企业掌门人。只招收30人，学期两年。目前已有人报名。这一消息立即引起网友关注。对此，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回应称，并不存在针对身家50亿以上企业家开办所谓“富豪班”，而是中大将面向大中型企业管理人员开办“后EMBA”班，希望参加教育培训的中高层管理人员所在企业的资产规模最好在30亿元~50亿元。

不管实情如何，这一新闻让一个舆论并不熟悉的概念“后EMBA”浮出水面。笔者上网查阅，发现有多所内地高校都举办了“后EMBA”班。相关招生简章提到EMBA侧重学员的系统管理和理论知识，而“后EMBA班”则侧重理念、观念教育，包括企业战略思维模式、战略思维视野、全球眼光和企业社会责任感等。据称，这与当今国际商学院的发展潮流是相吻合的。

“后EMBA”可能确实符合国际商学院潮流，可是，我国大学（以及商学院）的管理还没有融入国际潮流，由于“土壤”不同，所以就出现了“南橘北枳”的问题。与国外大学学位完全由学校自主授予、社会专业机构认证不同，我国大学的学位采取国家统一承认、授予的体系。拿EMBA来说，在国外商学院，其学历文凭是学校自主授予的，有没有含金量要由社会和受教育者评判；可在我国，攻读EMBA则是可以获得硕士学位的。

这就让我国EMBA教育发生了很大的变异，成为一些高官、高官获取硕士学位的便捷通道——按照EMBA的招生、培养模式，这是不需要参加统一入学测试的，被学校录取完成学业，可授予学位。通常来说，能否上EMBA主要看出不出得起学费。如此一来，EMBA被社会舆论质疑为“贩卖文凭”（对大学而言），以及“花钱买文凭”和“发展人脉关系”（对学员而言）。在其他学生辛苦地报考研究生时，高官们只要出20~30万元的学费就可读EMBA，然后顺利地获得学位。不仅建立了良好的“人脉关系”，还可继续攻读博士，完成从本科到博士的华丽“变身”。

在EMBA基础上发展来的后EMBA，有点类似我国的博士后教育。众所周知，在国外，博士后是针对博士毕业尚不工作者设置的过渡性研究工作；可在我国，这却异化成为比博士更高的“学历”（博士后是非学历教育）。学校举办后EMBA的意图很明显，就是继续开发EMBA资源，让企业老板继续出钱。然而，吸引老板们的又是什么呢？毫无疑问是发展更高端的人脉关系网（这就是中山大学强调企业产值规模的重要原因），以及更高的学历文凭。虽然目前的后EMBA不可能授予比硕士更高的学位，但是我国高校完全有能力将其打造成为像博士后那样比博士更高的“学历”。

所以，要让我国大学真正融入国际潮流，就必须改革我国大学中“国家承认文凭”的学历授予体系。具体来说，大学商学院可以举办MBA、EMBA或者后EMBA教育，这是学校的自主权，但学位的授予与国家无关，只是由学校自主授予。在这种情况下，学员选择MBA、EMBA以及后EMBA，由于没了学历文凭的价值，所以，就会关注真实的教育回报——花了那么高的学费，究竟值不值得。

在我国还没有打破国家承认学历体系时，很有必要对各类教育项目加以理清，不然就可能出现学校拿教育资源和学位资源去做交换的严重问题。在笔者看来，EMBA、后EMBA教育，在现阶段都应该归于非学历教育，也就是说，学员可以接受培训，但没有硕士学位，也无研究生学历。这可以避免学校用这类教育进行文凭贩卖，同时也引导学员们关注教育培训本身。

如果进行这样的区分，EMBA教育和后EMBA教育则不适合由承担学历教育的大和管理学院进行，而应该归为继续教育范畴。按照国家《教育规划纲要》，面向社会的大学继续研修机构属于“营利性”组织，其推出的培训项目主要是为了满足市场的多元需求。假如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不区分，学院一边承担学历教育，一边又承担非学历教育，会给当前的教育管理带来管理混乱、监管乏力、国有资产流失等一系列严重问题。近年来，我国一些高校举办的总裁培训班遭到社会质疑，多是因为此而起。

目前，大学的EMBA是学历教育，可后EMBA按性质来看尚属于非学历教育。由于教育的不同性质，这也是不该由承担学历教育任务的大学学院进行的。当然，导致这种尴尬处境的是我国的学位授予体系，所以，只有打破这一学位授予体系，才能让我国大学融入国际潮流。